

特朗普的强势回归与美国右翼民粹政治的主流化^[1]

林 玲 李常荣

【内容提要】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的尘埃落定，特朗普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的强势回归不仅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延续，更是美国右翼民粹政治力量壮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兴起于21世纪初期的“茶党”运动精神的延续和发展。从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后，“茶党”逐步在国会中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右翼民粹势力——“茶党共和党人”。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竞选口号，与茶党在反移民、本土主义、反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上形成呼应，2016年特朗普的胜选则被视为“茶党精神”深入白宫的标志。当前，特朗普即将再次入主白宫，标志着以MAGA运动为标识的右翼民粹力量已经成为共和党的主导政治力量。作为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的一个缩影，这一力量的主流化发展趋向，不仅对美国国内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将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政治格局带来重要改变。

【关键词】美国右翼 民粹政治 MAGA 运动 特朗普主义 美国优先

【作者简介】林玲，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李常荣，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4) 06-0127-23

[1] 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政党政治演化及其政治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3BGJ0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从两极向多极化发展，为资本的全球流动和经济活动的跨国界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在新自由主义的引领下，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国际资本突破关税及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了一场高歌猛进、攻城拔寨的“狂飙”，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欧美国家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贫富悬殊所导致的社会撕裂、产业空心化后的满目疮痍，以及中产阶级的持续萎缩。

作为对这种变局的回应，欧美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呈现崛起之势，以反建制、反全球化、反移民为特征的右翼民粹政治日趋主流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右翼民粹政党进入欧洲国家的权力核心，在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相继取得执政地位或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些政党相互扶持、结盟，对欧洲传统建制派政党和欧洲一体化构成了挑战。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在720个席位中赢得263个席位，占比接近36%。^[1]其中，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德国选择党等右翼民粹政党均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2]环顾整个欧洲，中左、中右执掌各国政坛的传统政党政治格局正在坍塌。而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强势回归标志着右翼民粹政治的主流化趋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以312张选举人票胜选，击败了获得226张选举人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他不仅赢得所有7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还同时获得了超过半数的全国普选票（得票率50.5%），与2016年大选相比，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展现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

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诉求，不仅体现于其“美国优先”

[1] Gilles Ivaldi, Emilia Zankina, “This year’s European elections remain under the shadow of rising populism,” <https://www.euronews.com/2024/11/13/this-years-european-elections-remain-under-the-shadow-of-rising-populism>.

[2] Paul Dallison, “EU election results: Far-right gains humble Macron and Scholz — As it happened,” Politico, June 9, 2024,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an-elections-2024-live-updates/>.

(America First) 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 等竞选口号, 更在其第一任期内转化为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实践, 如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以及在移民政策上的强硬立场, 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 通过透视 2024 总统大选背后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 深入研究特朗普主义及其兴起的社会根源, 对于前瞻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外政策的走向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一、民粹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脉络

民粹主义作为一个跨越 150 多年^[1]的现代政治现象, 始终如影随形地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从政治思潮^[2]、意识形态^[3], 到思想学说、社会运动, 再到政治策略^[4], 民粹主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和形态。之所以复杂多变, 是因为它能够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相融合, 根据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5]这种多样性和适应性使得民粹主义成为一种极具弹性和扩容力的政治力量, 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背景下发挥其影响力。

就意识形态而言, 现代民粹主义运动跨越了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端。但即便如此,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高辨识度的激进政治思潮, 其内部仍普

[1] 19 世纪后半叶, 俄国民粹派运动和美国平民党运动拉开了民粹主义闯荡世界政治的大幕。参见林红:《21 世纪世界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思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12/t20231207_5701994.shtml。

[2] 英国学者卡农·范认为, 民粹主义是动员“人民”反抗建制的号召。参见 Marg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No.4, 1999, pp.2-16.

[3] 英国政治理论家厄内斯特·拉克劳认为, 民粹主义是被统治阶级对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参见 Ernesto Laclau, *Th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Verso, 1977。

[4] 中国学者俞可平认为, 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 又是一种社会运动, 还是一种政治策略, 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与、广泛的政治动员”。参见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载《战略与管理》1997 年第 1 期, 第 88—96 页。

[5]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遍存在一种由民族主义者构建的“人民”与“他者”之间的对峙结构。^[1]在这种叙事框架中，民粹主义者往往将社会划分为两个群体：被视为国家柱石的“纯粹的人民”和对“沉默的大多数”^[2]实施压制的“腐败的精英”。他们将“人民”理想化为一个纯粹而均质的集体，其中，左翼民粹主义的“人民”概念基于阶级而非种族或宗教，其斗争矛头指向上层企业精英及其在政府中的同谋，指责他们背叛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而右翼民粹主义的“人民”概念则带有更强烈的种族意涵^[3]，往往具有种族—民族主义色彩，体现为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融合。^[4]民粹主义者宣称，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是民粹主义的独特性所在。^[5]这种宣示不仅体现了民粹主义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而且揭示了其在政治叙事中的核心地位——正是通过对“人民”概念的构筑，民粹主义者才能动员和吸引那些感到被现有政治体系边缘化的群体，从而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影响力。

美国是民粹主义最早兴起的国家之一，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曾指出，民粹主义“就像装饰的图案一样贯穿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6]作为一股蛰伏于美国政治深层的潜在社会思潮，民粹主义常常在美国社会面临巨大转型和危机时喷涌而出，形成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7]

[1] 谭道明：《民粹主义的三个维度——以特朗普民粹主义为例》，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4期。

[2]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9, No.4, September 2004, pp.541-563.

[3] Kazin M.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Rick Shenkman, “The Shocking Paper Predicting the End of Democracy,” *Politico*, September 8, 2019,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9/09/08/shawn-rosenberg-democracy-228045/>.

[5] [德]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钱静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

[6]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7] 曾森：《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现实与民主根源》，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410科学版页。

（一）从“镀金时代”^[1]的平民党到现代草根运动：间歇式爆发的边缘力量

1892年美国“平民党”（People's Party）的建立通常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发端。平民党创立于垄断资本与寡头政治兴起的“镀金时代”，它以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农民、工人团体为社会基础，挑战东部的精英资本集团。平民党认为，商业资本通过控制土地、谷物仓储设施和铁路运输等关键资源，实现了对农产品市场的垄断；这不仅减少了农民的利润，也耗尽了他们的劳动力；加之银行和金融机构对农民提供的高利率贷款，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经济压力。作为农民、小规模生产者和工人的代言人，平民党认为，在工业化和金融资本主义扩张背景下，这些被边缘化的普通人才是真正的“人民”。基于为“人民”发声的政治主张和反建制、反精英的立场，平民党提出了全民公决、参议员直选、铁路和通信业国有化、实行累进税制等诉求以对抗资本集团，并在1892年大选中获得了100多万选票，占总票数的8.5%，成为首个在大选中取得突破的第三党。然而，平民党的核心理念最终未能被主流政党所吸收，在1896年大选后，其影响力迅速衰落。

平民党之后，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呈现出间歇性爆发的特征。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时期，曾任阿拉巴马州州长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1968年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以“被忽视和被遗弃的普通美国人”——反对联邦政府民权立法的南部保守派白人群体的代言人自诩，对推行种族融合政策的政治精英和建制派展开猛烈的抨击，主导了一场具有鲜明种族主义色彩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华莱士公然宣称“种族隔离必须今天实施，明天实施，永远实施！”他还猛烈抨击黑人民权运动，将其称为“暴政”和“骗局”。^[2]这场运动不仅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中存在

[1] “镀金时代”指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时期，该名称源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这一历史时期以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迅猛扩张为特征，但同时伴随着贫富分化加剧、腐败现象泛滥、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

[2] George Wallace, “A Segregationist's View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1964,” PBS, July 4, 1964, <https://www.pbs.org/wgbh/americanexperience/features/lbj-wallspeech/>.

的种族紧张关系，也揭示了民粹主义如何被用作政治动员的工具。

2011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剧，“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这是一场具有左翼民粹色彩的草根运动，其主要支持者包括中下阶层民众、学生、工会成员及知识分子。这些群体支持工会组织，主张提高对公司和富人的税收，并要求增加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的投入，以缓解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1]“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口号是“我们是99%”，旨在代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99%的普通民众，对抗掌握着大量财富和权力的顶层1%的精英。它不仅是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反弹，也反映了美国中下层民众深重的经济焦虑。

纵观美国历史上的民粹运动，民粹领袖通常以第三党或者独立候选人的形式参选，这在两党制的政治架构下，意味着他们难以在选举中取得突破性成功，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民粹运动通常以松散的草根形式出现，其核心诉求在于挑战主流政党的政策。这种挑战性导致民粹思想和社会力量很难被两大主流政党所吸纳。因此，民粹运动要么在选举失败后逐渐消退，要么在一段时间后归于沉寂，难以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产生持久和实质性的影响。

（二）从“茶党”到MAGA运动：美国右翼民粹政治的主流化发展

与“占领华尔街”同时期爆发的“茶党”运动^[2]（Tea Party），同样代表了民众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的不满，但与前者不同的是，这场具有右翼民粹色彩的“茶党”运动实现了与共和党的融合，并为此后特朗普的MAGA运动奠定了基础。2009年，面对金融危

[1] 周琪、沈鹏：《“占领华尔街”运动再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9期，第73—92页。

[2] “茶党”这个名称的灵感来源于18世纪波士顿的“茶叶党”。1773年，波士顿“茶叶党”通过制造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来抗议英国殖民政府对北美殖民地征收的茶叶税，这一行动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而现代“茶党”名称中的“Tea”是“Taxed Enough Already”的缩写，意为“税收已经够高了”，凸显其要求联邦政府减税的核心主张。

机的冲击，奥巴马政府签署了《复苏与投资法案》，动用近 8000 亿美元的资金，旨在提振消费者信心并促进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然而，该法案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分配不均、监管不足等问题，导致大量资金流向了大型企业和承包商，普通民众所获得的直接补助则相对有限。加之次贷危机导致的房价下跌，使得低收入群体的资产大幅缩水，而富人则受益于政府的救市计划，继续享受金融资产带来的收益，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2009 年，美国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一系列以“茶党”为名的抗议政府过度开支、高赋税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游行示威。“茶党”运动随即获得了包括石油巨头科赫家族（Koch family）在内的大量资金支持，特别是“美国繁荣联盟”（American Prosperity Alliance, APA），作为长期受科赫家族资助的福利组织，成为推动“茶党”运动的重要力量。^[1]APA 不仅帮助“茶党”运动人士深入了解政策细节，还提供进一步的培训，以引导其政治能量形成规模化效应。^[2]得益于石化巨头与大财团的资助，“茶党”运动由零散的抗议活动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

“茶党”运动的支持者主要分为两大派别：经济保守派和“基督教新右翼”^[3]（New Christian Right）。前者强调市场自由，要求大规模减税、削减政府支出、减少财政赤字、反对财政救助和补贴，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方案^[4]；后者聚焦社会文化议题，反移民、反堕胎、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构成了社会保守派的核心力量。^[5]两者均反对“大政府”，排斥少数族

[1] 刘永涛：《茶党运动与重铸美国极端保守主义》，载《教学与研究》2013 年第 9 期，第 55—63 页。

[2] Jane Mayer, “Covert Operations,” *The New Yorker*, August 23, 2010,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0/08/30/covert-operations?printable=true>.

[3] “基督教新右翼”又称“宗教右翼”，以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为主体，集合了天主教徒、摩门教徒以及犹太教保守派等群体，包含了以“道德多数派”“基督教联盟”“家庭研究委员会”“捍卫自由联盟”等全国性组织为代表的系列宗教团体。

[4] 赵敏：《美国“茶党”运动初探》，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10 期，第 31—35 页。

[5] 张惠玲：《论美国宗教与政治》，载《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第 87—90 页。

裔与移民。政治理念的相通使宗教右翼与世俗右翼逐步联手，共同推进“茶党”运动的战略目标，即重铸极端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对外政策上，“茶党”主张保持美国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信奉里根（Ronald Reagan）时代保守主义“以超强军事实力维持和平”的理念，反对削减防务开支，其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投射于对华政策，表现为渲染“中国威胁论”，强调中美战略竞争，主张减少对中国的商品和借债依赖，秉持贸易保护主义。

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同，“茶党”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以介入选举政治为路径、以扩大政治影响力为目标的政治运动。2010年起，“茶党”运动与共和党中的保守派力量逐渐合流：“茶党”获得了约半数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的支持^[1]；在当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茶党”运动支持的129名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与9名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成功当选；在首次入选国会的83名共和党众议员中，“茶党”支持的候选人多达60名，助力共和党重夺众议院控制权。^[2]事实上，自里根时代起，“基督教新右翼”就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选举中为共和党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获得了“基督教新右翼”全国性组织“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的有力支持。该组织领导人提姆·拉哈耶（Tim LaHaye）于1981年创建了“国家政策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 CNP），这是一个致力于保守主义运动的基督教右翼集团组织，其活动和成员名单均高度保密。美国民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曾于2016、2021年两度披露CNP的成员名单，显示其为数不多的400余位成员中不仅汇聚了广泛的右翼社会力量，包括“基督教新右翼”与“茶党”活动分子、金融家与企业大亨、右翼智库与媒体人、教会学校校长及法律专业协会“联邦党人学会”（Federalist Society）成员等，还包含了数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与政府

[1] Pew Research Center, “Trump’s Staunch GOP Supporters Have Roots in the Tea Party,” May 16,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9/05/16/trumps-staunch-gop-supporters-have-roots-in-the-tea-party/>.

[2] Kate Zernike, “Tea Party Set to Win Enough Races for Wide Influenc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10, https://www.nytimes.com/2010/10/15/us/politics/15teaparty.html?_r=1&hp.

要员，如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艾德文·米斯（Edwin Meese III）、小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以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教育部长贝奇·德沃斯（Betsy DeVos）等人。这表明该组织长期发挥着为共和党高层官员与右翼社会力量搭建联络平台的作用。在1994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自诩为“美国最大的保守派草根政治组织”^[1]的“基督教新右翼”政治团体“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利用其广泛的组织网络，增强了共和党的选举实力，最终帮助共和党夺得国会参众两院。^[2]对此，当时的共和党首席竞选顾问威廉·莱西（William Laxey）坦承，“没有宗教右翼卓有成效的支持，一个共和党人要想赢得竞选提名或大选是绝对不可能的”。^[3]2016年美国大选时，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与“茶党”的“夺回我们国家”的口号相呼应，“茶党”的政治热情因此再度被调动，“茶党”活动分子在宾夕法尼亚、北卡罗莱纳、俄亥俄等摇摆州的深入政治动员为特朗普的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4]

作为共和党内的右翼民粹力量，“茶党共和党人”^[5]成为特朗普在国会中的重要盟友，在呼应特朗普政府税收和移民政策的同时，对制衡、削弱党内建制派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15年，一批“茶党”国会议员从众议院最大的保守派党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中脱离，成立了众议院“自由党团”（House Freedom Caucus），意在以更为强硬的姿态抗衡党内建制派。“自由党团”延续了“茶党”的政策主张，反对“大政府”、强调减税、反移民。其首任主席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作为反移民政策的忠实拥护者，极力主张修建美墨边境墙，此后曾出任特

[1] 参见美国“基督教联盟”网站介绍，<https://cc.org/about-us/>。

[2] 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第43页。

[3] Birnbaum,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alph,” *TIME*, May 15, 1995, p.30.

[4] Bryan Gervais & Irwin Morris, *Reactionary Republicanism: How the Tea Party in the House Paved the Way for Trump's Vic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5] 茶党运动对共和党保守主义的重塑产生了重要影响，部分共和党人来自茶党，因此被称为“茶党共和党人”。参见 Theda Skocpol and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朗普的白宫幕僚长。2016年特朗普执政后，“自由党团”积极推动特朗普政府的减税和非法移民政策，推动了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以来联邦政府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减税和就业法案》的出台，该法案将本土企业税率从35%下调至21%，旨在减少美国企业向海外迁移、促进制造业回流，以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同时，特朗普废除了奥巴马政府推行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大幅收紧非法移民政策。2023年10月，“自由党团”主导了对时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Kevin McCarthy）的罢免，使得麦卡锡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而此后议长候选人的“混战”及议长的一度难产，均凸显出共和党内右翼民粹力量与建制派之间的裂痕。麦克·约翰逊（Mike Johnson）——一个社会保守派及MAGA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尽管在国会任职资历最浅，但因为得到了以“自由党团”为主体的极右翼的拥护，最终成功当选为众议院议长。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遭到极右翼反对的建制派候选人则陆续退选或败选，显示出共和党内建制派的日渐式微。特朗普在2024大选胜选后即将重返白宫之际，已提名国会中的“茶党共和党人”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担任国务卿，右翼民粹力量的决策影响力将随之进一步扩大。

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主流化的深层原因

从“茶党”运动、“自由党团”到特朗普MAGA运动，当今美国右翼民粹政治呈现主流化发展态势，并已逐步演进为重塑美国保守主义与共和党的主导性力量。多项民调显示，约40%—50%的共和党选民以MAGA自称或支持MAGA运动。^[1]右翼民粹政治主流化的演进进程不仅是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简单串联，而是深植于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裂变、人口构成的多元化、政治生态的极化、社交媒体的普及及其所引发的“回音壁效应”中。

[1] 刁大明：《美国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最新发展》，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2期，第5—22页。

（一）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右翼民粹政治主流化的前提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为右翼民粹政治的复兴提供了土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市场自由，放松市场监管，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均与贫富分化。同时，联邦政府对公共福利和社会服务投入的减少，进一步加剧了低收入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焦虑，引发民众对政府和精英的不信任和反感。2008 年金融危机导致房价暴跌，中产阶级家庭投资价值大幅缩水，而联邦政府的救市政策却使得顶层财富增加，造成了战后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富不平等。^[1] 据统计，2010 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净值中位数为 69487 美元，相较 2001 年的 72956 美元下降了 4.75%；约 85% 的中产阶级认为维持生活标准比 10 年前更困难。^[2] 此外，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缩减，从 1971 年的 61% 降至 2021 年的 50%。^[3]

对此，2012 年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62% 的美国中产阶级认为是国会造成了中产的萎缩，而 34% 的受访者则归咎于奥巴马政府。^[4] 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降，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 37% 降至奥巴马时期的 22%，同时对国会的支持率仅有 25%，创下历史新低；约 56% 的民众对联邦政府“感到沮丧”，创下自 1997 年以来的新高，而仅有 19% 的民众表示对联邦政府感到基本满意。值得关注的是，在对政府“感到沮丧”的人群中，

[1] Moritz Kuhn, Moritz Schularick, and Ulrike Steins, “Research: 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Drastically Increased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 13, 2018, <https://hbr.org/2018/09/research-how-the-financial-crisis-dramatically-increased-wealth-inequality-in-the-u-s>.

[2]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lost decade of the middle class,” August 22, 2012,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2/08/22/the-lost-decade-of-the-middle-class/>.

[3] Pew Research Center, “How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has changed in the past five decades,” April 20,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2/04/20/how-the-american-middle-class-has-changed-in-the-past-five-decades/>.

[4]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lost decade of the middle class,” August 22, 2012,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2/08/22/the-lost-decade-of-the-middle-class/>.

白人高达 60%，还有 23% 的白人甚至表示对政府“感到愤怒”。^[1]2011 年，《华盛顿邮报》、哈佛大学和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联合发起的全国性调查显示，相较于其他群体，未获得大学学位的白人对美国的经济前景最为悲观。他们认为美国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也不相信辛勤工作能保证成功。^[2]

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被视为经济衰败的重要根源，民众期望寻求政治代言人以改变现状，对执政党和现有政策的不满构成了民粹运动的社会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民粹主义领导人通过强调当前政治精英与民众的脱节，并承诺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找到了调动民众政治热情的策略和话术。中下层白人群体的悲观和愤怒不仅激发了反对精英的民粹情绪，而且与奥巴马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的当选有着直接关联。对于白人保守派来说，奥巴马的当选不仅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转折，也象征着少数族裔在多元文化政治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拜登上台后延续了奥巴马时期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强调少数族裔的权益，并实施宽松的非法移民政策，加剧了白人群体对丧失文化主导权的焦虑，进而激发了其守卫“白人身份政治”的意识。

（二）人口结构变化与文化认同危机：右翼民粹政治主流化的基础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非白人移民的持续涌入改变了国家的族裔面貌。根据 2020 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1980—2020 年间，非拉美裔白人占全美人口的比例从 79.4% 降至 57.8%；而拉美裔和亚裔人口比例则分别从 6.4% 增长至 18.7%，从 0.2% 增长至 6%。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 1790 年美国开展每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以来，2010—2020 年首次出现了白人人口的负增长。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8 岁以下的少数族裔人口占比过半，升至 52.7%。这一数据超出了此前

[1] Pew Research Center, “DISTRUST, DISCONTENT, ANGER AND PARTISAN RANCOR,” April 18, 2010,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0/04/18/distrust-discontent-anger-and-partisan-rancor/>.

[2] 黄湘：《美国裂变——大历史转折点上的总统大选》，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第 69 页。

50.2%的人口增长预测。^[1] 据此，人口普查局预测，到2044年，少数族裔将构成美国人口的多数，虽然非拉美裔白人仍为最大的族裔群体，但他们将不再占据多数地位。^[2]

这一人口结构的转变不仅预示着族裔比例的变化，也引发了对于白人文化传统主导地位的忧虑。一方面，白人基督教徒的数量持续下降。根据2023年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有关美国宗教与宗教派别的调查数据，白人基督教徒的人口比例已从1976年的81%降至44%，而白人新教徒仅占30%，这表明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主导地位正面临挑战。^[3] 另一方面，从奥巴马到拜登政府，民主党力推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性少数群体（LGBTQ+）权益、少数族裔平权等系列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对白人基督教传统主流文化产生了冲击。2021年6月，拜登发布行政令，责令联邦政府各部门推进“多样性、公平与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DEI）计划，旨在使美国联邦政府成为性少数群体的“模范雇主”。此外，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任命了国务院首位“多样性和包容性首席官员”，以提升少数族群在国务院的代表性。在保守派白人基督徒看来，“联邦政府要致力于营造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基督教的地位会因此式微，联邦政府也成为基督教的拦路虎，贬低上帝的重要性”。^[4] 另外，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与反主流文化运动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这一思潮倡导文化多样性、少数族群权益与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文化、新闻

[1] 美国人口普查局2020年人口统计数据，<https://www.census.gov/library/visualizations/interactive/race-and-ethnicity-in-the-united-state-2010-and-2020-census.html>。

[2] Sandra L. Colby and Jennifer M. Ortman, “Projections of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U.S. Population: 2014–2060,” U.S. Census Bureau, March 6, 2015, <https://www.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publications/2015/demo/p251143.pdf>。

[3] “2022 PRRI Census of American Religion: Religious Affiliation Updates and Trends,” 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February 24, 2023, <https://www.prri.org/spotlight/prri-2022-american-values-atlas-religious-affiliation-updates-and-trends/>。

[4]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Press, 2016.

媒介、族裔政治和消费市场等领域迅速发展，使得少数族群的多元文化和政治诉求日益凸显，甚至趋向激进。这种趋势加剧了白人群体对文化主导权的焦虑，特别是在中下层白人中，他们感受到了一种“被围困”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上的不安与社会贫富差距导致的“经济焦虑”相互叠加，最终催生了白人保守派的强烈反弹^[1]，推动了具有种族—民族主义色彩的右翼民粹政治的兴起。

（三）政治极化：右翼民粹政治主流化的加速器

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不断加剧，两党之间的分歧愈发难以调和。政治极化压缩了两党政治妥协的空间，继而为党内民粹力量撬动政治力量平衡、发挥影响力提供了空间。在202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一度“难产”的选举中，代表极右翼保守派的“自由党团”正是利用了两党之间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所产生的权力运作空间，在这场持续4天、历经15轮的投票拉锯战中，最终与约翰逊·麦卡锡达成了一项关键性协议——推出“新规”，作为支持他当选众议院议长的回报。在麦卡锡成功当选的当天，他便宣布了众议院“一揽子规则”，其中最为关键的变革是，“自由党团”在众议院非常关键的规则委员会中占得三个席位，这意味着赋予了该团体实质性的议程设置权，使其能够对任何即将进入投票阶段的议案施加影响，甚至进行阻挠；另一重要的规则变更是降低了启动罢免众议院议长程序的门槛，仅需一名议员提出动议即可触发。这不仅简化了罢免程序，也为国会中的极端政治力量提供了一种机制上的保障，从而增强了他们在政治过程中的影响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有了相关程序的简化，仅凭“自由党团”的马特·盖茨（Matt Gaetz）一人提出罢免动议，就最终导致麦卡锡在2023年10月被罢免。

[1] “白人反弹”（White backlash）一词因此应运而生，它通常用来描述在社会中某些群体感受到他们的文化、社会或政治地位受到威胁时的反应。这种反弹可能表现为对政策、社会变化或特定群体的敌意或反对，尤其是当这些变化被认为会削弱他们的优势地位时。参见 Daniel J. Hopkins, *White Backlash: Immigration, Race, and America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四）社交媒体与信息泡沫：右翼民粹政治主流化的放大器

社交媒体已成为民粹主义传播和动员的重要工具。民粹领袖往往善于利用社交媒体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以直白的语言引导和放大民粹情绪，通过社交媒体构建一个同质化的信息环境，即所谓的“信息茧房”，使得民粹主义信息得以广泛传播。在这种环境下，其支持者被不断灌输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通过“回音壁效应”进一步强化了民粹主义观念，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为，从而产生直接的政治效应。^[1]

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时以“推特治国”著称，通过社交媒体直接对公众进行政治传播与动员。据统计，2017年特朗普上任一年内就在原“推特”平台上发布了2000余条推文，其中提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达百余条^[2]，不断在舆论圈层中制造话题，引导舆论。他以“清道夫精神”捍卫美国白人基督教传统主流文化，以“怀旧、追溯性”的民族主义煽动对社会变革忧心忡忡的“普通人”，推动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情绪走向极化。^[3]其粉丝则凭借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对特朗普的言论进行解释、修正，形成舆论合力。“X”（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于2022年收购“推特”后将其更名为“X”）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也成为特朗普竞选团队进行动员与传播的重要平台。^[4]社交媒体传播的广泛性及其产生的“回音壁效应”提升了民粹政治动员的有效性。

从2016年至2024年的连续三次美国大选中，共和党经历了明显的“特

[1] Max Schaub and Davide Morisi, “Voter mobilization in the echo chamber: Broadband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in Europe,” *Carlo Alberto Notebooks*, No.584, pp.1-53.

[2] Andrew Buncombe, “Donald Trump One Year on: How the Twitter President Changed Social Media and the Country’s Top Office,” *The Independent*, January 2018,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us-politics/the-twitter-president-how-potus-changed-social-media-and-the-presidency-a8164161.html>.

[3] 胡文涛、吴茜：《特朗普的“推特执政”：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交媒体政治上位》，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10期，第145—151页。

[4] Elon Musk, Twitter, July 14, 2024, <https://x.com/elonmusk/status/1812256998588662068>.

朗普化”，标志着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在塑造共和党政治理念方面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中下层白人民众作为特朗普 MAGA 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不仅构成了特朗普稳固的选民基本盘，也是推动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政治基础。在这三届大选中，特朗普在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工薪阶层白人中的支持率呈稳定增长态势：从 2016 年的 64%^[1]，到 2020 年的 65%^[2]，再到 2024 年的 66%；而特朗普在家庭年收入 5 万以及 5 万—10 万美元的中下层选民中的支持率分别领先哈里斯 3% 和 5%。^[3]这反映了特朗普对白人中下层选民群体的持续吸引力，以及其政策和言论在塑造该群体政治倾向方面的影响力。

此外，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两届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获得了白人福音派选民的坚定支持，分别达到了 81% 和 78%，这一比例不仅使该群体成为全国投票率最高的选民群体，也超越了里根和小布什在该群体中的支持水平。^[4]2024 年的出口民调进一步显示，白人福音派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依然坚挺，保持在 80%^[5]，凸显特朗普在白人福音派选民中所拥有的稳固民意基础。

三、“美国优先”：右翼民粹主义的政策投射

“美国优先”作为政策口号，其根源深植于民族主义的土壤之中，而当

[1] Pew Research Center, “An examination of the 2016 electorate, based on validated voters,” August 9, 2018,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8/08/09/an-examination-of-the-2016-electorate-based-on-validated-voters/>.

[2] Pew Research Center, “Behind Biden’s 2020 Victory,” June 30,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1/06/30/behind-bidens-2020-victory/>.

[3] Emily Guskin, Chris Alcantara and Janice Kai Chen, “Exit polls from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lections/interactive/2024/exit-polls-2024-election/>.

[4] Frank Newport, “Religious Voting and 2020 Election,” Gallup News, November 13, 2020. <https://news.gallup.com/opinion/polling-matters/324410/religious-group-voting-2020-election.aspx>.

[5] Emily Guskin, Chris Alcantara and Janice Kai Chen, “Exit polls from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2024.

这一理念被右翼政治力量所采纳并大力推广时，它便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特有的标志。“美国优先”政策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提出的，并在其葛底斯堡的“执政百日计划”演说中得到了详细的阐释。该政策主张“美国的国内利益优先；美国与美国人的安全利益优先；美国工人的就业、收入与安全优先”，并承诺所有的贸易、税收、移民、外交决策都将以美国工人和家庭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一政策框架涵盖以下方面：一是美国国家利益至上，避免卷入任何海外冲突，除非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受到直接威胁；二是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外国不公平竞争的侵害；三是倡导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策，通过调整税收、放松监管，留住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和财富，为本国工业带来繁荣；四是对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抱持怀疑态度，强调本国公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美国优先”既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执政目标，也是其采取的政策手段。

2024年7月，共和党发布了题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政纲，依然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它以“献给美国被遗忘的男男女女”作为开篇词，以“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美国普通民众的代言人”自居；序言以“美国优先、回归常识”为标题，凸显出共和党政治理念中右翼民粹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地位。通过这种形式，共和党旨在重塑国家认同、强化民族主义情绪，并以此作为凝聚支持、推动政策变革的基础。根据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所提出的政策承诺与主张，可以预见的是，在其第二任期将持续推进与深化“美国优先”的政策议程。这一政策导向将对美国的贸易、移民政策及对多边机制的参与产生直接影响。

（一）在右翼民粹主义风潮下高筑贸易壁垒

自2016年大选以来，特朗普政府就将“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目标与对华贸易政策紧密绑定，以此作为其民粹政治动员的有力武器。在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下，特朗普将中国塑造为“导致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认为中国的崛起是“造成美国失去昔日辉煌的关键因素”。

据美方统计，2016年—2023年的8年间，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分别占

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 47%、47%、48%、40%、34%、33%、32%、26%。^[1] 中国被描述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之一，通过“出口补贴、操纵汇率”等“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削弱了美国工人的竞争力，进而导致美国中西部“锈带”等制造业集中地区的经济困境，而这些地区的低技能白人工人成为遭受损失最大的群体。因此，中西部白人成为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支持对华实施强硬贸易政策的主要势力。^[2] 在特朗普民粹主义的话语逻辑中，中西部的白人工人是“美国这个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但“外国人、移民和民主党执政精英一直在密谋压制他们，现有权力结构背叛了他们并对他们毫不尊重”。^[3] 因此，特朗普以对华发动贸易战、重构中美经贸关系作为对核心选民进行民粹政治动员的重要支点，给经济民族主义赋予民粹主义色彩。

2024 共和党党纲明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目标，其中一大目标为“确保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具体措施包括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此外，在另一大政策目标“拯救美国汽车工业”中，也同样指涉中国，称共和党人将取消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产业补贴，并阻止中国汽车进口美国，以重振美国汽车工业。^[4] 2024 年 11 月 25 日，特朗普在自创社交媒体网站“Truth Social”上宣称，将在上任的第一天签署命令，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 10% 的额外关税，并将对墨西哥与加拿大进口的所有商品加征 25% 的

[1] 2016—2023 年间，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分别为 3470 亿美元（2016）、3750 亿美元（2017）、4180 亿美元（2018）、3420 亿美元（2019）、3080 亿美元（2020）、3520 亿美元（2021）、3820 亿美元（2022）、2791 亿美元（2023）。参见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2] 罗振兴：《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视角的考察》，载《美国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79—102 页。

[3] 林红：《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中的白人身份政治》，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 年第 6 期，第 56—65 页。

[4] 2024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July 8, 202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2024-republican-party-platform>.

关税。这也意味着特朗普将亲手撕毁在其第一任期签署的美加墨三国间基本免税的贸易协定。^[1]此前，特朗普还曾扬言将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以降低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地位。^[2]

（二）更为强硬的非法移民政策与关税政策的“泛武器化”趋向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强调“重新守卫住美国国界”，反移民政策是其民粹政治动员的重要抓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颁布的“禁穆令”、终止“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修建美墨边境墙等系列行政令，凸显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倾向。2024 大选期间，特朗普的反移民言辞相较此前两次大选更为激烈。他将非法移民称为“罪犯、毒贩和恐怖分子”，称其“毒害了美国国家的血液”，认为非法移民的涌入是对美国的“入侵”^[3]；宣称上任后将开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驱逐行动”，将动用军队驱逐百万非法移民，并增派执法人员加强边境安全。^[4]特朗普通过将移民问题与犯罪、毒品、反恐等安全问题挂钩，推动本土主义、排外主义的民粹思潮。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特朗普不仅沿用了将非法移民问题与毒品挂钩的选举话术，而且进一步将非法移民、毒品问题与关税政策进行捆绑，意在将关税作为与墨西哥、加拿大、中国这三个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进行谈判的杠杆。特朗普威胁将持续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实施 25% 的关税，“以惩罚他们荒谬的边境开放政策”，并声称这一政策将持续到“毒品特别是芬太尼

[1] Peter Hoskins, “Trump vows tariffs on Mexico, Canada and China on day one,” BBC News, November 26, 2024,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vg7y52n411o>.

[2] Jeff Stein, “Donald Trump is preparing for a massive new trade war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7,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4/01/27/trump-china-trade-war/>.

[3] Jacob Rosen, Kathryn Watson, Olivia Rinaldi, “Trump blasted for saying immigrants are ‘poisoning the blood of our country’,” CBS News, December 18, 2023,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immigrants-poisoning-the-blood-of-our-country-reaction/>.

[4] Daniel Payne, “The Trump agenda: Here’s what to expect from his second term,” Politico, November 6,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4/11/06/donald-trump-second-term-policies-00187157>.

以及所有非法移民停止对美国的入侵”。^[1]与此同时，特朗普罔顾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和中美禁毒合作的进展，将芬太尼泛滥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放任芬太尼前体通过墨西哥流入美国，以此作为对中国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的理由。可以预见的是，相比于第一任期，特朗普第二任期很可能把关税当作更为泛化的施压筹码，不仅将其作为解决美国贸易逆差与产业空心化的手段，而且试图将关税与移民、毒品等更多政策议题联动，呈现出关税政策的“泛武器化”趋向。

（三）延续“反多边主义”与“退群外交”

在经济民族主义理念的主导下，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核心政策是摆脱多边贸易机制的束缚，转而推动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公平贸易”。特朗普认为，多边贸易协议会导致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流向低成本生产国，从而损害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并增加美国的贸易赤字。因此，他主张用双边贸易谈判取代多边贸易机制，以此达成对美国更有利的条件，从而更有效地“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2]例如，特朗普2017年上台不久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了重新谈判，最终在2018年11月签署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来取代NAFTA。

特朗普的民粹政治逻辑也投射于对外政策，表现为对国际政治中的建制即国际机制的摒弃。在其第一任期内，美国相继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与多边机制平台，包括《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

[1] Evelyn Cheng, “Trump vows an additional 10% tariff on China, 25% tariffs on Canada and Mexico,” CNBC News, November 26, 2024, <https://www.cnbc.com/2024/11/26/trump-vows-an-additional-10percent-tariff-on-china-25percent-tariffs-on-canada-and-mexico.html>.

[2]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 January 23, 201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17-2021.state.gov/us-TPP-withdrawal/>.

国万国邮政联盟等。在拜登政府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后，特朗普在大选中承诺，上任后美国将再次退出该协定，以允许进行更多的化石能源钻探和开采活动。特朗普在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时，强调他服务于美国“匹兹堡人民，而不是巴黎人民”。^[1]2024年12月，特朗普在媒体采访中披露其下一任期的主要施政目标时表示，如果北约盟国不“支付各自的账单”，他“绝对会”考虑退出北约。^[2]事实上，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已多次表明这一态度。特朗普曾多次要求部分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直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3]

这些“退群外交”举措事实上反映了“特朗普主义”二元化的政治诉求：一方面通过战略收缩和强调“美国优先”来聚焦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以经济民族主义来对抗全球化进程给美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不再追求全球范围内复杂的联盟体系，而试图通过减少国际责任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寻求以最低的成本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因此，以“美国优先”理念为核心的“特朗普主义”表现为一种“新孤立主义”，它有别于美国历史上传统的孤立主义，是孤立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体。^[4]这一“新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以谋求维护美国霸权为根本诉求，而在形式上则很可能会表现为强烈的反全球主义与单边主义，将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严重冲击。

[1] “Why Trump’s 2nd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will be different,” Politico, November 10, 2024,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paris-agreement-climate-sustainability-us-cop29-global-pact-warm/>.

[2] “Trump discusses cutting Ukraine aid, mass deportations in first post-election TV interview,” December 8, 2024.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41208-trump-touts-tariffs-mass-deportations-and-nato-skepticism-in-tv-interview>.

[3] Victor Goury-Laffont, “Trump reportedly wants NATO members to boost defense spending to 5 percent of GDP,” Politico, December 21, 2024,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reports-donald-trump-nato-members-increase-defence-spending/>.

[4] Mead, Walter Russell. “The Return of Hamiltonian Statecraft: A Grand Strategy for a Turbulent World,”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024, pp.52–66.

结 语

随着特朗普的强势归来与共和党的进一步“特朗普化”，以右翼民粹主义为标识的极端保守主义正演进为共和党的主导力量，推动民粹政治的主流化发展。这种政治趋势不仅加剧了美国社会内部的族群对立与政治极化，还助长了本土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潮的蔓延；在对外政策上，则表现为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与“新孤立主义”。

以“美国优先”为导向的民粹政治投射于对华政策，则集中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在美国对华贸易投资、产业政策、公共采购等领域的渗透，构成了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严重阻碍。同时，“美国优先”所蕴含的“零和思维”将给中美开展双边合作与对话带来根本性挑战。这意味着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给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带来更大冲击。

然而，高擎“美国优先”大旗的右翼民粹政治真的能带领普通美国民众重返昔日荣光吗？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和高关税措施虽然旨在促进制造业回流、增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但实际上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高关税未必能有效促使制造业大规模回流，因为即使叠加上关税，从海外采购商品的成本依然低于国内生产。而从2021—2023年的数据来看，美国制造业回流效果有限，制造业贡献率分别为10.2%、10.3%和10.2%。^[1]其次，提高的关税使得美国企业在进口商品时面临更高的成本，而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研究机构预测，10%的关税可能会使美国通胀率上升

[1]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 Value added by Industry as a Percenta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November 8, 2024, https://apps.bea.gov/iTable/?reqid=150&step=2&isuri=1&categories=ugdpind&_gl=1*1k3m4mg*_ga*MjA4MTAzNTkzNC4xNzM0NDE4NzUw*_ga_J4698JNNFT*MTczNDQ4NDY0Mi40LjEuMTczNDQ4NjMwMC42MC4wLjA.#eyJhcHBpZCI6MTUwLzJzdGVwcyI6WzEsMiwzXSwiZGF0YSI6W1siY2F0ZWdvcmlscyIsIkdkcHhjbmQiXSxbIIIRhYmxlX0xpc3QiLCIyMTEiXV19.

约 0.8%，给制造业带来额外负担。^[1]以特朗普第一任期为例，他曾援引美国《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进行调查，并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援引《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款对华进口商品发起调查，并于 2018—2019 年先后公布四轮 301 关税清单。这直接导致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 2017 年的 3.1% 飙升至 2019 年的 19.3%，为加征关税前的 6.2 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2023 年发布的《232 和 301 条款关税对美国产业的经济影响》报告指出，特朗普第一任期所执行的关税举措使得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攀升，进而推高了商品价格，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压力。^[2]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研究估算，特朗普当前提议的关税将使美国普通家庭每年增加超过 2600 美元的消费成本。^[3]同时，关税升级还将意味着美国贸易伙伴实施报复性关税的风险，由此引发的关税反制措施将导致美国商品的竞争力下降，尤其是对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等传统出口行业造成重大的打击。这一系列政策的未果乃至其“反噬”效应，终将会使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旗帜黯然失色。

【收稿日期：2024-08-15】

【修回日期：2024-12-25】

（责任编辑：邢嫣）

[1] Scott Horsley, “Here’s what Trump 2.0 means for the economy, from tariffs to mass deportations,” NPR News, <https://www.npr.org/2024/11/06/nx-s1-5181327/trump-election-economy-tariffs-deportations>.

[2]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Economic Impact of Section 232 and 301 Tariffs on U.S. Industries,” March 15, 2023,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5405.pdf>.

[3] David Goldman, “Trump ups the ante on tariffs, vowing massive taxes on goods from Mexico, Canada and China on Day 1,” CNN News, November 25, 2024, <https://edition.cnn.com/2024/11/25/politics/trump-tariffs-mexico-canada-china/index.html>.